

□ 特稿

出版转型与阅读文化重建^{*}

◎ 聂震宁

摘要：出版数字化转型与阅读文化重建，显然是数字出版实践中最需要讨论的问题。从出版数字化转型给人们的阅读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进而讨论阅读文化重建的理念和实践，显然有利于客观审视数字出版发展的现状，有利于人们趋利避害地接受数字出版，有利于从根本意义上不断改进和完善数字出版业态。阅读文化问题，主要涉及到阅读的意义、阅读的价值、阅读的方式、阅读的选择、阅读的环境等，其中，核心的是阅读的价值问题。

关键词：出版转型；阅读文化；重建

一

出版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许多专业人士对专业出版、教育出版的数字化演进所取得的业绩给出了几乎是激动人心的评价，对大众出版也表示了乐观的估计和展望，表达了欣喜之感。在几乎所有以数字化出版为主题的论坛上，专家们在演讲中都要重复地不厌其烦地指出，出版数字化转型不可阻挡，出版业剩下的几乎只有顺昌逆亡的选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出版数字化转型还处于进行之中。我在2008年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数字出版：距离成熟还有长路要走》。5年过去，数字出版毫无疑问还有长路要走。转型的现在进行时态告诉我们，作为一种全新介质的出版行为，数字出版的成熟程度还远远不能与传统纸介质出版比肩。因而，我们在为数字出版的某些奇迹惊呼与赞叹的同时，决不能就此满足从而而停止探讨的步伐。一部科技发展史告诉我们，质疑与不满，进而推动不断的探讨，乃是人类科技进

步的内在逻辑。

倘若我们能理解人类科技进步这一内在逻辑，那么，对于数字出版的某些质疑与不满，就不会简单地被看做是保守主义的灰暗心态和时代落伍者的酸葡萄心理。对于出版数字化转型，我曾经表达过这样的看法，那就是：数字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未必昌，逆之者一定亡。为什么顺之者未必昌？因为成就一份事业不仅要看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还要看是否在正确地做事情。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能看得出，问题永远处于解决与未解决之中。记得电子邮件最初使用时，人们欢呼这是一项伟大的创新，我们中国人亲切地称之为伊妹儿。紧接着就产生了垃圾邮件，伊妹儿就受到了警惕，电邮创新好像就没那么伟大了，提供电邮的网站就有了过滤垃圾邮件、欺骗性邮件乃至攻击性邮件的责任。网络阅读遇到的问题几乎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网络出版，网络阅读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阅读，而网络阅读中的不可靠又随处可见。最近在网上看到揭露网络出版的问题。一些无良出版商利用开放获取模式，欺骗研究者，特别是

那些在学术交流中没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作者，出版由研究人员作者付费的假冒期刊。这些期刊的总部许多都宣称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但实际上却在巴基斯坦、印度或者尼日利亚运作。无良出版商向研究者们发送垃圾邮件，招揽论文，但却绝口不提需要作者缴费的事。之后，等到文章被接受出版时，作者们才被告知需要缴纳一般为1800美元的费用。学术出版挑选最好研究成果的职能正在消失，他们几乎愿意接收全部的文章，只要作者愿意出钱就好了。这样的事情的结果是，作者们失去了保持质量的强劲内在推动力，而读者在这些文章面前也失去了阅读的可靠感觉。据说，在印度新的无良出版商或期刊每周都有涌现，他们的出现是因为市场的需要——成百上千个印度和其邻国的科学家需要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出来，以此获得职称和晋升。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出版业的权威性、公信力迅速大打折扣。

在人们为出版数字化转型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举出这样一个实例，不免有些扫兴。我也很喜欢出版数字化转型，总在为接踵而至的数字出版创新激动不已。但这些扫兴的实例却是必须设法解决的事实。我们要使得数字化出版顺之者比较昌，就得以必不可少的忧患意识来清醒认识数字出版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数字出版目前尚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二

出版数字化转型与阅读文化重建的问题，显然是数字出版实践中最需要讨论的问题。阅读问题从来就是出版业发展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阅读是出版业传播知识文化的功能最直接的现实。出版业人士通常所说的“读者是上帝”、“上帝”的满意度，亦即受众阅读的满意度，应当是出版业发展评价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出版数字化转型给人们的阅读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进而讨论阅读文化重建的理念和实践，显然有利于客

观审视数字出版发展的现状，有利于人们趋利避害地接受数字出版，有利于从根本意义上不断改进和完善数字出版业态。

在数字化转型中，人们在为阅读效率的极大提高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为阅读的碎片化问题、浏览式阅读问题、实用主义阅读问题以及浅阅读、泛阅读、读图、读视频、网络狂欢等等负面问题表示了深刻的忧虑。然而，更为深刻的问题是，随着数字化转型的达尔文主义被人们所接受，数字化带来的这些负面问题，似乎已经被众多的读者忽略不计或者说就此接受，甚至包括原先的许多忧虑者。对于原先那些忧虑乃至抱怨，似乎可以用得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一些诗句来嘲笑和自嘲。也就是说，忧虑者尽管忧虑，抱怨者尽管抱怨，数字阅读中上述那些负面问题依旧快乐地进行。这样的态度一方面体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乐于迎接新事物的乐天心态，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新事物成为潮流时，许多人很自然会出现的从众心理、盲目状态、犬儒主义。

正因为此，在人们为数字出版的某些神奇现象啧啧称奇而狂欢的今天，作为有责任感的出版人和出版理论研究者，更应当针对出版业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鉴于出版数字化转型对传统的阅读文化正在造成致命的冲击乃至消解，故而这种讨论具有价值体系重建的意义，可以称之为阅读文化重建。

三

阅读文化问题，主要涉及到阅读的意义、阅读的价值、阅读的方式、阅读的选择、阅读的环境等。其中，核心的是阅读的价值问题。

下面从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大众出版三种出版类型的数字出版看看对阅读价值带来的问题。

首先从数字化专业出版来看阅读方面存在

的问题。数字化专业出版最为令人心仪的是其为读者提供解决方案的高效出版与阅读的神话。人们总是感兴趣于阅读效率的提高，惊讶于相关知识检索能力的提升。数字专业出版确实有效解决了这方面的实用性需求。然而，专业阅读并不仅仅要解决阅读速度和效率提高的问题，也不只是需要解决检索需求问题。在专业阅读过程中，还有相当多元价值的东西可以在阅读中获得。当一位博士研究生就一部博士论文的写作从专业数字出版商获得解决方案的同时，极有可能的是，他将因此失去了一系列完整的专业阅读的机会。就拿最为抽象的数学来说，哈尔莫斯就说过：“数学是一种别具匠心的艺术。”波莱尔说过：“数学是一门艺术，因为它主要是思维的创造，靠才智取得进展，很多进展出自人类脑海深处，只有美学标准才是最后的鉴定者。”菲尔兹数学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认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漂亮的艺术，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数学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种学科都具有各自的艺术魅力。如果人们的专业阅读仅仅满足于各种知识元的检索和知识云朵的解决，如果人们把专业出版和专业阅读仅仅看成是知识处理过程，那么，人类社会将陷入科学主义的泥淖，各种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完整性研究将被忽略，思维科学将遭到弱化，蕴含于学科研究成果中的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将遭到遗弃，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是残缺的。为此，我们要说，数字化专业出版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如果只是满足于解决方案的获得，极有可能给读者造成多方面的损失，特别是人文精神和思维科学方面的损失。

教育出版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阅读问题与专业出版比较类似，但层次更为丰富，问题更为复杂。现代教育事业越来越需要弘扬人文精神，需要对人的素质的全面培养，需要更多的人与人的交流，而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升学。数字教育出版在这方面有可能造成阅读上的很大损失。快速的检索在为学生提供现成答案、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正好违反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当

然，通过数字化出版来提高学习效率是必要的，我们都在享受提高效率的好处。但是，我们不能把学习简单化，把阅读简单化，更不能为了提高出版的效率而造成阅读学习的简单化。

大众出版的阅读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的，一类是休闲的。休闲的大众阅读主要是指读者为了休闲、审美、娱乐、愉悦等目的的阅读。实用的大众阅读即指读者通过阅读获得思想文化上的教益、写作艺术的修养以及各类知识的认知。许多时候实用与休闲交融于大众的阅读生活中。诚然，在电子阅读器上人们已经可以读到很多很好的小说、人物传记和文化读物，读了之后一样会有很好的收获。但是，目前对于大众阅读影响最大的是移动阅读而不是电子书，移动阅读包括移动阅读碎片式信息、原创园地的海量文字以及视频、读图、播客、微博乃至短信，凡此种种的数字出版物，充斥大众阅读的时空，这就不能不予以认真对待。尽管大众阅读与专业阅读、教育阅读的专门性要求不同，但求开卷有益，通常无所谓碎片还是完整，浏览还是专注，浅阅读还是深阅读，泛读还是研读，可大众阅读事关国民素质的养成，又绝非无可无不可之事。在大众阅读过程中，如果普通大众读者总是处于碎片式的移动阅读状态、鼠标快速浏览状态、只言片语的浅表性阅读层面，更有甚者，如果总是处于道听途说、街谈巷议、张口就来的即时性阅读状态，缺少必要的完整性，缺乏真挚的感受，无意于深致的体验，加上数字出版传输的便捷和样式的新鲜，使得大众中潜心阅读者越来越少而走马观花者、道听途说者越来越多，则不仅实用性阅读的收获无从谈起，就连休闲性的阅读享受也会堕入混乱之中，作为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的大众阅读则可能南其辕而北其辙，适得其反，误入歧途。

四

我们之所以要针对出版数字化转型来讨论阅读文化重建的问题，乃是因为出版业的每一次重要创新，都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阅读行为。从数字出

版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阅读的过程来看,由于拥有许多技术手段的支撑,数字出版使得读者的被动、被选择、被接受的程度空前上升。这一问题也应当在阅读文化重建时加以讨论。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应当予以大众进行阅读选择的自由,并且建立起保障这一自由的秩序。尽管一个人从小阅读或许是被动的,是被选择的过程,但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却是从被选择到自主选择的过程,自主选择的能力越强,个人的阅读能力就越强,阅读心态、阅读心智也越成熟,而社会的阅读文化也就越成熟。

然而,在数字出版阅读上,人们在阅读的选择方式上出现了由主动选择向被动阅读反向发展的趋势。在很多时候,人们在网络上接受的是侵入式阅读,广场式阅读,甚至还会出现反复冲击式的阅读。此类阅读信息服务体现了出版主体传播能力的提高和服务意识的强化,事实上读者从来就需要不断地接受各种信息从而做出阅读的选择。但是,问题在于,在电脑上,读者经常需要停下已经开始的阅读,对于屏幕上忽然跳出的一个又一个八卦的新闻标题做出阅读与否的选择,当读者正在倾尽心血研读一部专著或者倾情体验一部纯情文学作品的时候,忽然遭到屏幕上倏然闪出的颇具情色冲击力的广告冲击,主动的阅读与被动的阅读经常面临博弈。更不要说在博客世界里那种竟日进行的广场式阅读,在强化了阅读自由度的同时,阅读的主体性同时也被消解了。

我们得承认,上述被动阅读的问题不是数字出版的错,而是数字技术魔匣里经常会蹦出的怪物,倘若理性的人类不加控制,那魔匣里指不定还要蹦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东西来。在这样的时代里,需要我们对阅读的方式和环境保持必要的自主能力,也需要数字出版者做出共同的努力,在发展数字出版的同时,不断地优化我们的阅读方式和环境。

五

数字出版最为引为骄傲自豪的是速度问题。数

字出版的阅读速度无疑也得到了极大提高,阅读的快与慢也就形成了激烈矛盾。在传统出版条件下,人们讨论阅读的快与慢这对矛盾,仅仅在于治学修养的不同需要上。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阅读的快与慢矛盾则几乎达到“生存还是死亡”的激烈程度。

为此,一个时期以来,国际读书界出现了一个慢阅读运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有一位教授托马斯正在大力开展慢阅读的实践。他主张细细阅读一本好书,反对一目十行。他说,慢阅读能唤回阅读的愉悦,从高品质的文字中找到乐趣和意义。他严厉批评学校鼓励学生开展阅读速度和阅读数量的竞赛,认为只是对阅读价值的破坏。托马斯教授还在课堂上开展慢阅读教学。他鼓励学生回到传统阅读中去——大声诵读甚至背诵,要求学生“琢磨”和“品味”文字。可想而知,已经习惯在网上快速浏览网页的年轻大学生们,再次面对纸质读物时,竟然出现了注意力很难集中的阅读障碍——托马斯说,“我想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一目十行中失去了多少。”他要求学生一定要慢阅读。前不久也有大学教授跟我说,现在学生都没必要去图书馆,就在数字图书馆上边直接借阅图书。我想这也很好,节约跑路借书的时间,有相当的好处。但是我们要谈的还都是阅读方式的问题。由于网络化借书的便捷,学生们现在屏幕上读书效果如何,会对我们的阅读带来哪些影响,需要认真讨论。加拿大约翰·米德马还以《慢阅读》为名出版了一本专著,力挺慢阅读。书中展开对慢阅读的价值分析,继而把慢阅读引申到作者与读者乃至与社会的关系上来看待。

一直以来,许多文化名人都主张缓慢生活,他们的一些主张可以对今天在数字化条件下忙碌生活的人们有所启悟。米兰·昆德拉有一部专著专门讨论缓慢生活的意义,书名叫《缓慢》。他写道: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古时候闲逛的人都去了哪里?民歌小调中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的流浪汉去了哪里?他们随着乡间

小道、草原、林地空间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米兰·昆德拉为田园风情的消失唱了一曲幽怨的挽歌。现代化、数字化进程必然不断加快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人们已经开始抱怨生活节奏快得令人喘不过气来，似乎都知道不快不行，可又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着急。阅读速度当然不可能幸免于其间。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不能一味地以快为美，而必须解决以人为本，科学解决好速度的控制问题，努力做到该快则快，该慢则慢。阅读文化的重建也应当作如是观。

六

在出版数字化转型中提出阅读文化重建问题，本质上是对社会阅读以及出版业坚守和弘扬人文精神的呼唤和引导。

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的主要内容，社会阅读以及出版业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弘扬，其次才是知识、信息的传播。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嬗变、解构乃至丧失，这是人类社会无可奈何的悲哀。人们已经被市场竞争、效率至上弄得相当疲惫，现在又要被数字技术搞得如此这般的支离破碎、踉踉跄跄，且不说那些急功近利的专业阅读、教育阅读，就连大众阅读的休闲式阅读，情意绵绵的阅读，思考人类命运的阅读，都变得匆匆太匆匆，好像明天立刻就要获得一个重大发现，然而这分明不过是人生应有的精神休憩。重建阅读文化，必须在人文精神的导引下，建立合理的阅读价值取向，构建多元的阅读方式，改善阅读环境，减少阅读的盲目性、从众性，增强阅读的理性、自主性。

重建阅读文化，则需要出版数字化的各种载体和传播方式运行中建立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阅读评价体系。此类阅读评价体系在纸介质出版的传统格局里业已形成，而这是成熟的阅读文化所必须的。尽管这种评价也许对大众阅读的自由度有所压制，容易造成社会管理机构权力的滥用，造成过于强化精英阶层权威的僵化现象，然而，这

毕竟是文明社会在无序与有序、理性与非理性一系列悖论面前的理智选择。数字出版特别是当前的网络出版，还没有形成应有的书评制度，这就不是一个完善的阅读文化环境。诚实的作者和读者在这种缺少标准、缺少价值评价的困境中会感到严重的困惑。不道德的作者和无良出版商却可以在系统内耍阴谋、玩阴招而无须担心受到正面力量的谴责，如此便将对人类社会正当的出版和阅读形成严重的威胁。作者和出版者应当抵制不受任何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拘束的出版方式的诱惑。为此，出版界和阅读界要立足于建立行业规则，提高行业识别出版舞弊行为的能力，建立起开放的评价环境，让亿万热情的网民睁大眼睛审视出版物的质量，发出批评的声音，从而建立起有序的阅读文化环境。

七

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数字出版派生出来的阅读问题，还应当通过数字出版理念和技术改进和创新来解决。这一轮出版的技术革命乃是在新技术引领下发生的，基本上是数字技术有何发明，数字出版物读者便去尝试进而被吸引、被接受。可是任何先进技术都存在着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的两重性，人文精神将要求我们趋利避害，不能让技术的负面作用肆意放大。阅读文化重建，正在对数字技术提出要求，数字出版业不能不负起相当的责任。

审视直至目前为止的数字出版与阅读状况，至少可以提炼出以下需要反思的问题：1.提供解决方案的服务并非数字化专业出版的全部，专业出版的全面价值和严肃性需要得到维护；2.数字化教育出版要把引导学生深度阅读、慢阅读作为业务突破的重点方向；3.数字化大众出版要提倡开卷有益，倡导品味和价值的提升，可以有原创园地海量文字上传，更需要强化网络出版的编辑环节；4.网络出版与阅读应当建立起以诚实为基础、内容为导向的作品评价体系，数字图书馆要把那些无良出版商从目录中删除；5.为确保用户阅读选择的自主权而建立更加健全有序的网络环境；6.网络技术提供商、移

动技术运营商有责任为建立网络阅读环境和移动阅读环境的秩序而努力。

总之，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出版业较之于出版业以往任何时候的社会责任都要重大而复杂，服务于社会阅读的责任也空前地受到高度关注，而目前正遭到相当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但无论遭到怎样的批评和质疑，绝大多数人士并不会因此诅咒数字出版，更不会诅咒数字出版的命运。《第一财经日报》曾于2006年3月28日发表一篇文章《因为互联网，我们需要做得更多》，其中，美国《华尔街日报》运营副总裁潘瑟艾罗说道：“内容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应该做出最棒的内容。至于读者的阅

读形式，我们不应该苛求。因为互联网，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正如他所说，我们希望数字出版在阅读文化重建方面做得更多更主动一些。这是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也是读者维护阅读权益的需求，无疑，更是包括数字出版业在内的整个出版界无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
*本文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数字出版内容国际传播平台应用示范》阶段成果，课题编号：2012BAH23F04

出版知识

旧派小说之一：政治小说

20世纪的前50年，旧派小说占领了很大的读者市场，涌现了政治小说、谴责小说、言情小说、社会小说、黑幕小说、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诸多种类。其中，政治小说由于有“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极富煽动性的鼓吹和几位著名职业政治家的撰作，影响极为巨大。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认为其原因在于忽视了“新民之道”，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将小说的功用拔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因而引出了政治小说的风潮。政治小说是日本19世纪80年代的特产，重要作品有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和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后者由梁启超翻译后自1898年12月起在《清议报》连载，反响巨大。1901年广智书局出版了该书单行本，1902年编入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到1906年11月曾重印过6版。继梁启超起而撰写政治小说的有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家蔡元培和陈天华。陈天华的《狮子吼》充满浪漫主义精神，是清末影响最大的政治小说。政治小说随着启蒙主义的理想光辉而出现，曾一度震动过国人的心灵，但它过分偏重宣扬政治理想，缺乏小说的神采和审美趣味，因此很快成为过眼烟云。

（摘编自武汉大学出版社《畅销书风貌》）